

中国社区研究的经典 观察传统农村的窗口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农村生活： 对云南高晓的社区研究

[美]科尼利尔斯·奥斯特古德 著

何国强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农村生活： 对云南高峣的社区研究

[美]科尼利尔斯·奥斯古德 著

何国强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的农村生活:对云南高峣的社区研究/[美]科尼利尔斯·奥斯古德(Cornelius Osgood)著;何国强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3

书名原文: Village Life in Old China: A Community Study of Kao Yao, Yunnan
ISBN 978-7-309-12858-1

I. 2… II. ①科…②何… III. 农村-社会生活-研究-云南-20 世纪 IV. D4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9642 号

VILLAGE LIFE IN OLD CHINA: A COMMUNITY STUDY OF KAO YAO, YÜNN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Guoqiang He

©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New York 1963

© Cornelius Osgood 1982

根据纽约罗纳德出版公司 1963 年版本译出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的农村生活:对云南高峣的社区研究

[美]科尼利尔斯·奥斯古德(Cornelius Osgood) 著 何国强 译
责任编辑/岑品杰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5.5 字数 372 千

201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858-1/D·8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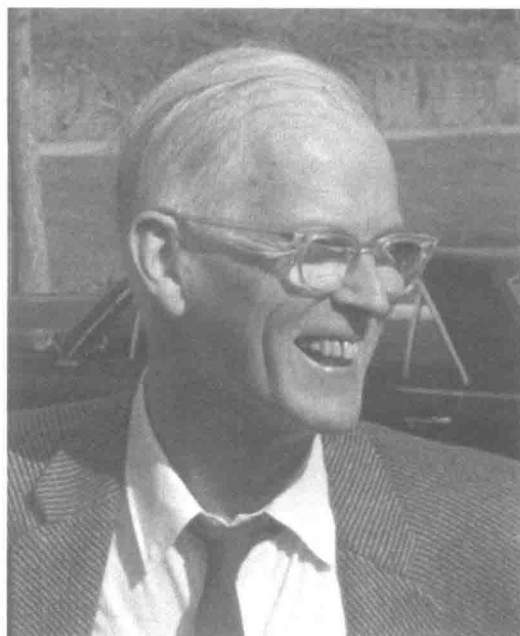
定价:6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古文字学家、中山大学陈炜湛教授为本书题字



科尼利尔斯·奥斯古德（1905—1985）

耶鲁大学皮巴蒂自然历史博物馆（Yale Peabody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提供

献给我的朋友李安宅

■ 保罗·霍金斯序

当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变革急剧而频繁,给小型社区的研究者带来挑战。尽管不少人知难而上、坚持研究,但很少有论述全面、见解深刻的作品。一个明显的例外,是1935年费孝通对上海以西128公里、苏杭之间、太湖岸边开弦弓村的研究。他侧重于经济,以粗细适中的笔调勾画出当地文化,为中国人类学界,也为他自己赢得了世界声誉。60多年来,到开弦弓的学者络绎不绝:1956年5月,费先生的伦敦经济学院同学、悉尼大学新西兰籍人类学教授威廉·格迪斯(William Geddes)^①到访;1981年9月,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女人类学家南希·冈萨雷斯(Nancie Gonzalez)到访;费先生本人也多次重返开弦弓,搜集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基本素材。时至今日,众多人类学课程和书籍对开弦弓的案例仍然推崇不止,这项成果的学术含金量,不仅是20世纪40年代奠定的,而且是后来多次追踪添加的。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海内外对汉人社区的英文研究成果中,有四颗璀璨的明珠。最早的一本书是葛学溥写的^②。之后,费孝通出版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接着,杨懋春发表《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

① 本书所有英文人名、地名、族名等,凡有必要的,一律在首次出现时,汉名之后附加括号,内存原全名,以方便核对,以后出现时,不再附加原文。——译者(以下凡作者原注均不标出,译者注才如此标明)

② 参见[美]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著,周大鸣译《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译者

头》，也是一篇博士论文。最后是科尼利尔斯·奥古德的《旧中国的农村生活：对云南高峣的社区研究》^①，此书虽然于 1963 年出版，叙述的却是 1938 年的田野研究。可以说，这四本书几乎是齐名的，相互媲美，并且各有一批追踪研究者。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一位年青的美国民族学家横渡太平洋，单人匹马来到云南昆明，在草海西岸找到一个村庄，住进去参与观察。恰逢多事之秋，战事紧迫，军队征集住房，加之两位燕京大学的合作者就要离开昆明，北上成都，赶往兰州，因此这次调查只持续了五周。幸运的是，调查组夜以继日地工作，收集到不少资料。这位美国人原打算战争结束后重返中国补充调查，可是，中美关系的发展背离了他的旨意。1961 年，他感觉有生之年再也难以实现这个计划了，便开启尘封的笔记本，重新整理旧材料，以学术对话的方式补充新资料，完成了这部大作。

奥古德笔下的村庄名叫高峣（本地人读作“桥”[qiáo]音），设于南昭东拓时期（765—816），开基者多为来自大理洱海地区的僰人和保保。从山上俯瞰，村庄为泥鳅形，以中心井台分界，靠西山一边为上村，靠草海一边为下村。1938 年，全村有 158 户、703 人，户均人口近 4.45 人。其中，陆地居民 122 户，492 人，水上居民 36 户，211 人。陆地居民基本上是本地人，水上居民则是从他处漂泊而来的“蛋”^②户，居住于下村临水一带。他们或以舟楫为家，泊于水面，或住在岸边的棚屋。三分之二的蛋民从事摆渡，东上昆明，南下晋宁，赖运载乘客和货物维生，尤以运送滇西生产的锅盐为多；三分之一的家庭则靠打鱼为生。当时已出现公路运输，水运受到排挤，蛋民生活艰辛。

1951 年土地改革，蛋户分到田地和房屋，上岸与高峣村民共居，越来越多的人告别舢板，脱离水上生活，成了种地的农民。后来，一部分人到搬运公司当工人。操持旧业的家庭越来越少，渔船和网具所剩无几，今天

① 旧中国指 1840 年至 1949 年这一段时间。英文书名的主标题直译是“旧中国的农村生活”。全书主要涉及 30 年代的云南农村，但也触及 40 年代的华北、华东和华南的情况，例如，第 22 章的比较与对话，因此将中译本书名调整为“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的农村生活”。——译者

② 史称“蜑”“𪚩”“蛋”，是形成于元明两朝，并活动于南方各省水面的少数民族。1951 年，国家组织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根据族源关系和名从主人的原则，将其划归汉族。“水上居民”是对浮生水面各族群的统称，“蛋”仅为其中的一大类。——译者

很少看到传统的舢板和渔具，代之而起的铁壳船是从别的地方传来的。自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以来，发电、水泥、玻璃、化工、制药、印染、铁合金、皮革、陶瓷、磷肥等厂矿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昆明郊区，不少分布于草海西岸，有些厂矿虽然不在湖边，却也建在流入滇池的五条河流两岸。鱼米之乡的滇池坝子，村舍本来就很密集，新建的工人村进一步集中人口，滇池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负荷。就高晓而言，水产研究所占据了渡头北面大片田地，堤坝上建起几个水泵房。20多年前，大规模的网箱养鱼使草海脆弱的生态坍塌了，水质变坏。到了2002年，湖水污染成为举国关注的问题。也就是那年春天，本人有幸两次访问高晓，目睹渔业陷入危机，耕地日渐稀少，许多村民到城镇和工厂谋事，每日穿梭于城乡之间。昔日的农耕、运输和渔业活动让位于工商业活动。

奥斯古德离开至今，将近八十年的光阴，星移斗转，高晓的生产方式、人口规模、行政区划、社会组织等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5年前的户籍显示，高晓有1330人（男565人，女780人），428户，户均人口3.1人。与1938年相比较，人口增长89%，家庭规模缩小30%，耕地减少了90%。实际上高晓的人口不止那么多，因为村里还居住着许多外地人，他们从省内外迁来，户口不在本地，人数和本地人不相上下。

对照书上的布局图，最大的变化发生在村子两头和中间：村尾外面围起一个大塘，菜园和水泵房堵塞了道路，古渡头不见踪影；村口的戏台楼，原是高晓的象征，20多年前也被拆除了；上村和下村各划出一大块宅基地，先后建起“小康”和“凤凰”两个新村；高海公路凌空越过村子中部，昆安公路从村边切过，站在任何一处都可以看到立交桥、高架路和新旧公路。高晓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为都市化的洪流洗尽昨日的风采。

村庄基础设施的建设有目共睹：水泥路取代了石板路；预制板盖住阴沟；宽大的公厕代替了矮小的茅厕，门口还有人收费；垃圾场是新建的，每天有专人清理；前面开店，后面住人的房子集中于上村和村口；二三层楼比比皆是，有的家庭起豪宅，盖车房。在我到达之前，公共井台南北向60米宽，东西向村道以外的稻田被征用了，推土机铲平了这块地皮上的28座旧屋，63个家庭搬到小康新村。全村农民的身份就要终结，改变为城市居民。鄙人的偶然造访使自己成为高晓巨变的西方见证人。

截至2015年底，昆明全市户籍总人口为555.6万人，57.2%的人口

住在城镇,住在郊区农村的不到总人口的一半。公路建设拉近了农村与城市的距离,不久高峣就要并入市区,事实上它已经成了“现代新昆明”规划的组成部分。这个规划包括“一湖四片”(绕着滇池建新城,形成四个新旧城区)、“一湖四环”(在东西南北城口建成四条环城线,四座四通八达的立交桥)。高峣被拖入宏大工程的建设之中,村庄的空间格局将完全改组。我在调查时看见村干道两旁家家摆起麻将桌,人们满眼迷惘,我不知道告别传统的农民将去何处挣钱养活自己?倒是听说村里出现了某些令人伤心的现象,例如,掘墓或盗尸(附录二宣布,这是村里没有的文化要素)。也许,这就是一个古村为都市化付出的代价。

村庄的地理位置没有变,村中干道,道旁房基,某些小巷,一切依然。渡头附近甚至还保留了一栋旧式楼房,所以,书上那张村庄布局图仍然是外来人的绝佳向导。

村中的几口公共水井(见插图 12)一直沿用到 2000 年,直到全村通了自来水。水牛依然作役畜用于犁田。田不多,牛不多,猪亦不养了,这倒适合城市化的步伐。目前不少人家还在养家禽、猫狗。旧市场改建成篮球场,戏台楼那块地皮建起新市场,旁边是茶馆,无所事事的人聚在那里品茶聊天、打牌赌钱。

人们告诉我,搞运动的年代,村里村外,旗舞东风(那天我在高峣和返回昆明城的路上,却没有见到一杆红旗)。蓦然回首,恍如隔世。高峣也像中国其他农村,实行自治,村民积极参加选举,政治热情不减当年搞运动的时候。村委会的旧办公室弃置几年了,门上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住在上村的村干部每天到下村的新办公楼上班。我去拜见村委会主任时,他带着友善的笑容,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和外国人面谈的要求,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必须提到小学。戏台楼和村小原是同一个院落,刚才说过,那个院落拆除以后,在教室的地皮上建起一座铁塔,为全村电视用户传送信号。小学于 20 世纪 50 年代搬到普贤寺。1965 年,又搬到寺旁一幢私人宅第,建起教学楼、教师宿舍。1994 年 11 月 10 日,高峣小学改名为徐霞客小学。徐霞客是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大约在崇祯十一年(1638),坐船从篆塘到高峣,在毛杨公祠午饭,之后游西山,写下《游太华山记》。毛杨公祠原与普贤寺分立,后寺祠合并,僧人代理供奉毛沂、杨慎二公。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普贤寺，菩萨和僧人都没有了，内设两个纪念馆，大大冲淡了佛寺色彩。徐霞客纪念馆和杨慎纪念馆展出的碑刻、追思者的官衔和抄录的诗文手迹等，似乎给人一种古人重杨公、今人重徐公的印象。其实，人各有建树，不可比拟。教育部门认为，在提倡科学的今天，宣传徐霞客的意义似乎更大。既然徐霞客和普贤寺有关，而高峣村小几度在普贤寺办学（参见本书第六章），学校完全可以利用“徐霞客”名字的无形资产。

1938年6月底7月初，奥斯古德在踩点的时候，向导告诉他高峣是个汉族村，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村里有一部分人的祖先来自大理和丽江。例如，段昭（焕章）的祖先是白族，木姓村民（木丽生、木丽明等）是纳西族，此外，还有从邻村娶入或入赘的其他少数民族（彝、傣、壮、布依等）人士。奥斯古德可能受条件限制，来不及进行全村的人口普查，另外，旧社会隐瞒民族成份的问题十分严重。因此，族际通婚早就出现了，嫁娶的对象有彝、壮等少数民族居民。婚姻自主，同时要参照父母的意见；反之，父母做主，也要参照孩子的意见。两种情形在村里都有。婚姻和计划生育，共同形成亲属结构的基础。

高峣原有的两间棺材铺、几间烟馆早已消失。政府大力推行火葬。但丧事仍然依照传统的方式进行：由香花和尚占卜，计算时间，选择葬地。

在下是一名英国民族学家，我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南亚次大陆和美国度过的，即在美国教书，在南亚做田野工作。我长期钟情于南印度巴达加人（Badaga）的文化，对尼尔盖利山四个毗邻村庄的农民家庭做了大量的调查。拙著《大地的宗族：巴达加人的家庭结构和人口统计》引用了12个印度村庄的深度调查，我对其中一个村庄的追踪，跨度为148年（1819—1967）。我的研究以扎实的田野工作和缜密的统计分析为基础，自认可以和前述四个汉人社区的研究交流。

我的南印度社区研究，值得一提的当推巴达加人，不仅由于他们构成印度唯一的单种姓社区，而且，这项研究从头至尾由我一个人完成，这在巴达加社区的学术史上从未有过；目前世界上只有三份实证材料表明印度农村的家庭规模处于萎缩状态，其中一份便是我的巴达加研究。当然，在下对于印度其他地方乃至对孟加拉地区的研究也颇具启发性，有关内

容可在布莱曼、克鲁斯和塞斯编撰的书^①中找到。我深信它们完全具有跟前述四本著作乃至对这四个村庄再研究所产生的成果对话的资格。

我的巴达加研究和费孝通的开弦弓研究具有异曲同工的风格,那就是锲而不舍,不断追踪,像中国清末大画家郑板桥所说的:“咬定青山不放松”。巴达加研究起自一次摸底调查,从此揭开了深度研究的序幕。在 1962—1963 年、1969—1970 年、1994 年以及其他年份,我转马灯般地在多个村庄参与观察。起初,我胸有成竹,脑袋里装着各种计划,却不知道自己会搜集到什么材料。1963 年和 1972 年,我对四个相邻的巴达加村庄做了两次人口调查,面对统计结果,无法设想用来证明什么。这恰好证明一条学理:作为先导的预设和解释性的假设是在三个台阶(田野工作开始之前,进行过程中,以及结束之后)上缓慢地建立起来的,而且上一个田野工作结束之后形成的假设可能是下一个田野工作开始时的预设,也就是说预设不是凭空出现的。从 1963 年开始,我在这四个村庄分别做了四次为期 9 年的人口调查,逐渐形成完整的资料库,涵盖村庄的每一个人,以便立竿见影地反映出家庭结构的变化,直观巴达加的社会分层。巴达加人对生命周期的看法是每 26 年为一代,据此,我把统计数据用于 1860—1914 年间巴达加基督徒的比较,结果证明切实可行。我对疾病率和死亡率的统计仅为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这要归功于我幸运地发现一些登记簿,敏锐地觉察到它们的价值。因为它们毫无遗漏地记录了 54 年间当地所有基督徒的每一次洗礼和葬礼,保留了大量的细枝末节,例如,家庭出生、社会地位,民族身份,导致死亡的可能因素,等等。实际上教会的登记一直延续到现在。虽然这些原始记录的对象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巴达加人,却反过来扩大了我对巴达加社区人口现状的理解。

选择前辈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调查过的社区进行研究,虽然不及到一个从未有人研究过的社区做调查那么刺激,但同样具有挑战性,而且学术意义有时可能会超越后者,因为这种社区由于前辈的研究而获得学术积淀,容易受到学者关注。学术意义是就研究活动本身对研究者与评价人的关系而言的。本文开头所说的四个汉族村庄就是这样,先是四位作者去开拓,

^① Breman, J., Kloos, P., & Saith, A. (1997). *The Village in Asia Revisited*.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品发表之后,他们有的人继续研究,或者引来旁人进行追踪。我希望自己对南印度巴达加农村的研究能够从方法论上为中国研究者提供参考。

我的研究心得大致如下:

第一,一个传统社区的现代化要求某些事物发生变化。例如,生计方式的改变,从粮食种植转向经济作物(茶叶、橡胶等),或者又从种植业转向房地产开发,经济从自给自足转向依赖市场,知识结构与技能结构由综合型转向专业型,获得渠道从父子传承转向学校教育,生活方式从乡下人转到城市中产阶级水平(品位、需求、人际交往,人生态度等)。各种变化的规模与速率不同,对当地人的影响也不同,研究者不应平列看待,而应先着眼于急剧的变化,再关注缓慢的变化。

第二,物质文化最值得留意。例如服饰。20世纪60年代我调查巴达加农村的时候,村民还很保守,70年代已很少穿民族服装,80年代末我去访问时,看到农村人无一例外地穿着城里人的服装,青年人穿牛仔服的不在少数。我问自己,是否城乡服饰的一元化标志了乡村的现代化?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其实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形。研究者还可以从住房、家用电器、小汽车、投资渠道等方面去考虑。

第三,现代化一定会带来人口问题。例如,农业人口减少,空巢家庭或空巢村庄的出现,教育普及与人口的横向流动(移民外地)及纵向流动(参军、求学、做官、经商致富)等。随着人口的变化,婚姻、家庭结构、亲属关系也会或速或迟地发生变化。人口既是因变量,又是自变量,所以应注意一些方面,例如,儿童价值观念的变化与生育率降低的关系,教育提升所造成的人口纵向流动等。这些问题在巴达加人那里都有反映,他们的人口出生率比上一代已经大大降低,经济的快速增长如今已经趋于平缓。当人口作为自变量时,地位更加重要。分析各种因素与人口的关系,需要把人口统计运用于田野调查,把不同年代的数据于回访时作一比较。

第四,最不易掌握的是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深层的东西很难测定,思想和心理便如此,几乎没有数据,即使有也很零碎。社会的阻碍也很重要。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尴尬的困境,我在印度碰到过,相信中国也有自己的保密原则。例如,资料不公开;研究者想去的地方或想见的人,得不到主管部门的批准;甚至有人不怀好意,把研究者看成密探。诸如此类,不足而一。前述四本书讲了农村人的信仰,那是旧中国的情

形。新中国政治运动频繁，一度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并且混淆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前后，看不到宗教活动，今天对此依然敏感。因此，怎样研究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本身就是个重要的问题。

中国和印度的国体不同，政体也不一致，因此，用巴达加的社区研究来判断和预测中国农村的文化变迁太冒昧了。不过，历史和现实中，中印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两国人民追求幸福的目标一致。本人专注于南亚的社会和历史，自到云南大学讲学始，读了许多与中国农村，特别是云南农村相关的人类学论著，在几个田野调查点获得走马观花的体验，我对高晓的追踪抱有浓厚的兴趣，只不过我的认识相当肤浅。

对中国农村社区的追踪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需要研究者加快速度。30 多年前，一个外国人捧着奥斯古德的书来到高晓，还可以看到老照片的许多影子，特别是鸟瞰半岛形村庄的那一张照片；现在则面目全非了。逝者如斯！我向村中老人展示照片，他们大都是奥斯古德调查时高晓小学的孩子。我得到的反馈是，没有人记得奥斯古德，也没有人听说过这本书，不过倒是有一些老人认出照片上的小学老师毕春明。我感到意外。引人注目的是，高晓周遭的村庄出了一位女人类学工作者，现在执教于云南大学。不过，她也从未听说过奥斯古德的名字。我想，随着本书译成中文出版，以及中国的研究者对整体方法的重视，该书的价值将日益凸显。

（写于 2007 年 9 月，中国广东珠海；修订于 2017 年 1 月，美国加州硅谷）

保罗·霍金斯(Paul Hockings)，1935 年出生于英格兰，早年就读于悉尼大学、多伦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1965 年获得伯克利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他在芝加哥伊利诺大学工作，并在南印度和西爱尔兰从事田野调查，是德拉威语专家和人口统计学家。他擅长医学民族志和视觉人类学，曾任《视觉人类学》期刊编辑，1995 年编辑出版《影视人类学原理》（中译本由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2007 年出版）等多部著作。1997 年开始，他受聘于云南大学，直到 2002 年从伊利诺大学荣誉退休。后来被加州圣·克拉拉大学聘为教授，继而为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国际学院教授、通识教育主任，并兼任《世界文化百科全书》执行编辑。

译 序

初次接触《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的农村生活：对云南高峣的社区研究》(以下简称《高峣》)是 2001 年与 2002 年之交的冬季。我在键盘上敲打了几个关键词，想了解美国西密歇根大学图书馆有什么研究中国的书籍，随着手指动作，一条引人注目的英文 *VILLAGE LIFE IN OLD CHINA* 呈现于屏幕。找来书，翻到一张黑白照片，乍一看，很惊讶，进一步浏览，才知道是写我所熟悉的一个村庄。

《高峣》表面上好像传教士的回忆录，实际根本不是那种类型，而是一本引人入胜的民族志，与作者的另一位同仁乔治·安布拉(1908—1950)的民族志——《须惠：一个日本村庄》^①的风格较为相似，贯注了纪实文学三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典型环境)的写作手法。

这本书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现在我仍然认为，事情的开端纯粹出于偶然，只不过当我意识到一种翻译的使命时，偶然才转化为必然。

作者科尼利尔斯·奥斯特古德，1905 年 3 月 20 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温彻斯特市。年青时在芝加哥大学求学，22 岁时获学士学位，26 岁时获博士学位；1930 年 9 月 25 日，与哈里特·埃伦·金莉(Harriett Ellen

^① Embree, John F. (1939). *Suye Mura, A Japanese Vill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xxxvii + 354.

Keeney)结婚,婚后生育了两个女儿,1962 年哈里特逝世,同年 11 月 23 日,续娶苏穗玲(Soo Sui-ling 音译);1985 年 1 月 4 日,因心脏病卒于康涅狄格州卡姆登市家中,享年 80 岁。

奥斯古德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北迪恩人(Northern Dene),导师是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1931 年,他去了耶鲁大学。先是在人类学系,从 1934 年起,成为该校皮巴蒂(Peabody)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监护人和民族学展馆馆长,直到 1973 年退休。在耶鲁期间,他以文化人类学家的身份,在北极、中美洲、东亚从事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方面的田野工作,为博物馆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藏品。

对阿拉斯加与毗邻的加拿大极北地区的田野调查,是奥斯古德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里程碑,他的民族学研究从那里扬帆启航。最初,他考察的对象是北阿萨帕斯坎人(Athapaskan),不久扩展到迪恩人 and 大熊湖地区的印第安人,继而扩大到库真人(Kutchin)、塔奈纳人(Tanaina)和伊钙利克人(Ingalik)。之后,他潜心研究阿萨帕斯坎人和伊钙利克人,正是这两个族群的研究给他带来世界声誉。

一般以为,更新世至少有三个冰河期和间冰期^①。4 万年前,人类已在西伯利亚和东北亚居住了。在维克塞尔冰河期(北美洲称威斯康星冰河期),一支亚洲人通过白令陆桥(今白令海峡)来到美洲,到距今 1 万年前,他们的后裔扩展到南美洲的顶端。这支亚洲移民便是美洲印第安人最早的祖先,称为“印第安汉人”。奥斯古德指出,阿拉斯加州和加拿大道森、育空和伊格地区的一支阿萨帕斯坎人明显属于这个人种。也许,除了他在晚年回忆中(参见《失意人生》)提到的家族原因以外,美洲印第安人和东亚人同种属的概念是吸引奥斯古德把触角伸到中国的又一动因。

奥斯古德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作品:

《北迪恩人的民族志》,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30 年

《大熊湖印第安人的民族志》,载《加拿大民族博物馆期刊》(1931 年年

^① 冰河期指地球广大地区为冰层覆盖的时期。间冰期指每两次冰河期之间,气温回暖,冰层萎缩的时期。冰河期和间冰期造成地球除赤道以外各地大面积冰层分布、海面高度及动植物种类与数量的改变。例如,在艾斯特冰河期鼎盛时,世界上近 1/3 的陆地为冰河覆盖,当海洋的许多水分冻结成大陆冰层以后,海平面就下降,最低时下降了 197 米,许多大陆架暴露出海面,形成陆桥。

报)》，1932年第70期

《库真人对民族志的贡献》，载《耶鲁大学人类学学刊》，1936年第16期，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北阿萨帕斯坎人的分布状态》，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1936年

《塔奈纳人的民族志》，载《耶鲁大学人类学学刊》，1937年第14期，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伊钙利克人的物质文化》，载《耶鲁大学人类学学刊》，1940年第22期，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北美土著的语言结构》(与哈利·海杰合作)，纽约：维金人类学基金报 1946年

《文化：经验主义与非经验主义的特性》，载《西南人类学期刊》，1951年第7期

《冬季：遥远北方一位男子所经历的一段奇怪而挥之不去的记录》，林肯市：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 1953年

《伊钙利克人的社会文化》，载《耶鲁大学人类学学刊》，1959年第53期，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伊钙利克人的精神文化》，载《耶鲁大学人类学学刊》，1959年第56期，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印第安汉人：阿拉斯加一育空边界地区的民族志和历史资料汇编》，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1971年

《加拿大博物馆和美国博物馆中的人类学》，密尔沃基：密尔沃基公立博物馆出版社 1979年

对加勒比海地区的考古发掘是奥斯古德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里程碑。人类学史专家比阿特丽斯在《美洲问题专家的研究》一文中中肯地指出了这项研究的意义。她说：1933年，耶鲁大学皮巴蒂博物馆开展的加勒比海项目，是加勒比海人类学研究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这都应该归功于奥斯古德的积极和热情，是他一手启动了项目，他还写了一些重要的论文。后来人们将标志该项目发起 25 周年的作品献给了他^①。奥斯古德在这

① 参见[英] T. K. 彭尼曼著，和少英、高屹琼、熊佳艳译《人类学一百年》第 287 页，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又见 Mintz, S. (ed). (1960). *Papers in Caribbean Anthropology*. Ya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Nos. 57-6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